

第五代学人丛书

主 编：杨匡汉 白 烨

林 焱 著

百年

风

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国民性的变迁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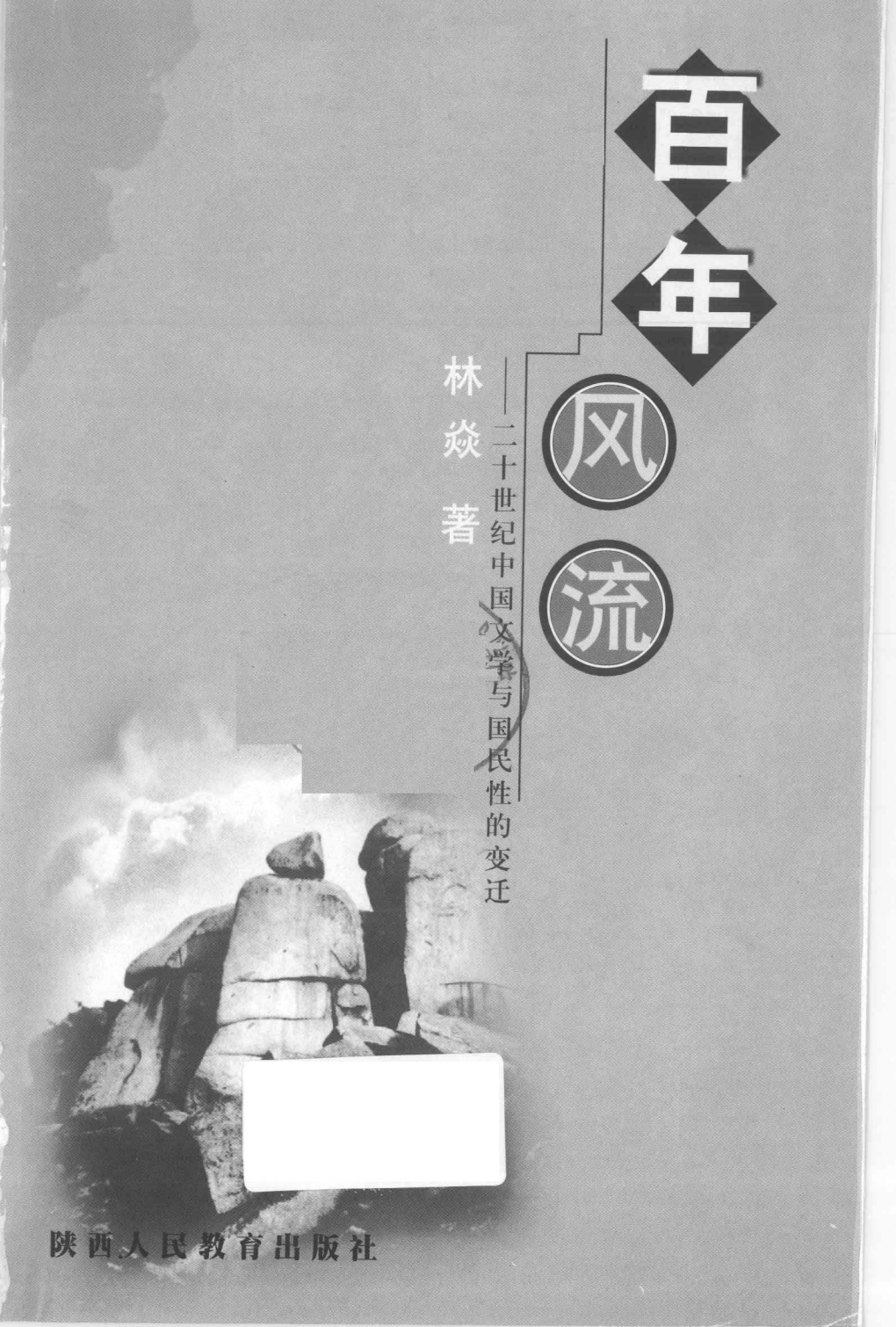
百年

风

流

林焱 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国民性的变迁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风流：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国民性的变迁/林焱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

(第五代学人丛书/杨匡汉，白烨主编)

ISBN 7-5419-7801-9

I. 百... II. 林...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522 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 18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 插页 11.125 印张 272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5.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24

总 序

20 世纪对于中国社会的演进至关重要,20 世纪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举足轻重。“5·4”、“1949”、“1976”、“1997”,这些数字已不简单的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所包孕的历史内涵,所负载的时代情绪,已深深地印于人们的心海,铭入史碑的记载。在这个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中国文学,也自然充满了大悲大喜的歌哭和大开大阖的曲折。而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的一员,文学研究工作者对这一切更有着身临其境的体验和百感交集的体味,在身经和心历两个方面都与其研究对象——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密不可分。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造就了自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它在本世纪的最晚近的成果,可能就是造就了自己的“第五代”文化人。按照时下人们关于“代”别的看法,“第五代”约出生于 50 年代,成长于 80 年代,活跃于 90 年代。其在不同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已作为中间力量挑起事业的大梁。这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第五代学人”,有承继前几代学人治学传统的一面,但更有结合新的文学现实在兼收并蓄中铸造自己个性的一面。概括起来看,这主要是,选取问题比较注意人们不易觉察的盲点或众人纷说不一的难点;阐发问题常能有人所少思,人所未见;论文说理带有注重学理的明显特点。

当代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标志不仅是新一代学人的不断涌现与崛起,还在于在研究方法及治学观念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更新。文学研究较之以往,

紧贴政治的视角在逐步淡化，一统不变的观念也在更变，文学研究工作者都在随着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涅槃”，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自己。而这其中，由年轻的“第五代学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讲究学术本位和学理个性的追求，则更为豁人耳目。汇集于“第五代学人丛书”第一批的8位作者和8种著作，可以说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从而充分显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五代学人”的已有风采和发展势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近年来吸纳了不少文学研究新人，其中“第五代学人”已开始当代文学研究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了展示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和加强当代文学研究事业，我们组编了这套以新选题、新思路、新见解为主的“第五代学人丛书”，望能藉以推进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的趋向，壮大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生力量，同时也为回眸世纪文学之路留下一代人忧深思远的理论思考。

杨匡汉 白烨

2002年4月6日，北京

题 解

“国民性”是文化学的重要概念,也称“民族性”或“文化精神”。

本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即“国民性”进行提炼与归纳,以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例证,对各时期我国文化精神进行比较与阐释。

“国民性”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所表现的第一个重要的题材,也是新文学试图回答的第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

本书力图阐释文化精神在中国文学中多种方式的表現。通过对 20 世纪几个重要时期文学作品的剖析,发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特点,发现本世纪文学创作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成果及弊端。

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文学作品中关于国民性的流变,同时以文学作品为窗口观察本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走向。本书对今天社会情绪、社会观念的由来和发展,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与重建,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

“风流”二字，既可解释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可解释为风俗教化。《百年风流》之“风流”，就是文学与风俗教化的结合，就是“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及其发展。

目 录

第一章 序篇：世纪的回眸 001

20 世纪，经历了一千多年封建社会超稳衡状态的中国，几度发生过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巨变。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国民性）——社会整体性的、由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所铸成的性格内容——随之也发生了几次深刻的、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大一部分被作家所感受，被文学作品所记载。濒近世纪之末，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曾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回顾，并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的“裂变”进行剖析，揭示民族性格的走向。

第二章 苦难与狂欢 039

在中国，谁最早感受到改变文化性格的必要，谁又最早尝试着改变自己的文化精神内容？这些被“蛇”引诱而偷尝禁果的人，这些作为革命的、文明的“先锋与桥梁”的知识分子，他们已被证明注定要长久地承受着文化性格裂变和痛苦。其实，这些痛苦，对于他们而言，也许就是所要追求的大欢乐。只是，

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似乎永远为了最初的追求，而浸泡在酩酊的痛苦中。

第三章 选择与抛弃 079

每一代青少年都有其成长过程的特殊性。五四时期的青年与刚刚结束“浩劫”的一代，所处的精神环境有着某些相似——已然的文化精神、文化性格几乎都发生严重的倾斜以至濒于坍塌。世纪初的青年曾经作过一次相当茫漠的选择，他们很“自由”也带着很大的行动的疲惫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古老民族文化的苍凉的大地。面临着一个新世纪的青年，他们的养分不仅仅取之于古老文化的残羹，而是享有世界文化的盛宴。他们的文化精神的确立，是更容易些呢？

第四章 追求与失落 124

社会改革与改革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尖锐的抵牾，就像革命者与他所信奉的革命经常会有矛盾甚至致命的冲突一样。改革者在欢呼和迎迓改革时，总不能自觉地把自已作为“改革”的第一个目标。他们总是以自己心中已经形成的“图式”，作为范本和目标——当然，他们也并不总能准确把握地了解自己心中的图式，他们经常只是在涌动的情感的表面上进行目标的尝试。文学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经常与社会伦理结构产生互动式反应。“文化大革命”后，伦理道德领域里进行一场有“文化”意义的大革命。文学的爱情主题也敏感地由家庭伦理结构引起的悲剧，向情感冲突引起的悲剧转移。

第五章 驯顺与叛逆 160

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性格相反的女神，一个是驯顺的赫斯嘉，一个是叛逆的雅典娜。赫斯嘉服从着环境的需要，成为弥合社会裂痕的自觉的牺牲者；雅典娜则永远不被驯服，永远充当社会平和秩序的破坏者。中国女性，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女性，也有这两种基本性格类型。过分的自我关注，莫名的不安全感与不完美感，自愿选择精神与生命的危难状态。女性“高价位”的自我感觉，以对男性的蔑视、鄙视或仇视作为铺垫。“女权”不是永远在升值的社会砝码，准确与恰当的定位也应该是“女权”法规的一章。

第六章 平庸与狹邪 204

平庸似乎永远伴随着生活的失意者。他们所处的庸凡狹邪的生存环境也许是他们真正应该选择的理想归宿，但是，平庸的他们只有这一点是不甘庸俗的，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总是要进行改造，试图改造得不那么平庸些。然而，很可惜，他们的德与行，未能使这一目标得到实现，而且，事情往往会变得更糟一些。市民的狹邪气像是有弹性的球，被重重地压了一下，会更高地、更强烈地反弹起来。社会理性精神受挫折时，人们普遍对市民的生活理想取相当大程度的认同，小市民习气成了社会文化的大潮。

第七章 浮躁与深沉 250

文化精神是一种长期的社会群体生活所形成

的具有规范性的性格内容，它可以在绵长的历史中，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当人们意识到须要改变它时，总是有着深沉的心理积淀和深沉的心理动因。恰恰可能就是这种深沉，使得开始努力改造自己文化性格的人，显得那样的浮躁。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近现代中国的革命、中国的改革多次源起于农村，农民的革命与改革的要求多次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革。人们很容易发现、也乐于指责这种“浮躁”的方式，但人们似乎还没能用不“浮躁”的方式对文化精神进行大幅度的推移。

第八章 腰着与超越 294

家族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的价值存储体。中国长期宗法社会传统，使平民甚至贫民也都非常重视家族观念。在每一个家族的历史案卷里，都有异常神奇的人物和故事，这经常是困顿的家族精神再生的依据。然而，这往往并没有带来家族精神的再生，反而增加其痛苦并造成种种精神和行为上的荒谬和怪异。家族史题材小说，追求驾驭、蹂躏近现代历史的自由情绪。一半揭示社会的家族化结构的弊端，另一半不自觉地抒发对社会化的家族结构形式的悼亡伤逝之情。

第九章 后记：世纪的前瞻 336

20 世纪中国的国民性特点与文化精神的变化，是否已完全被文学作品所描绘和记述？回答当然不是完全肯定的。文学不可能充当社会的机要秘书，文学也不是社会的档案馆。西方历史学家说，东亚

将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的主轴”。但西方政治家却说，“预测中国的未来是有风险的”。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探讨，“惟一的科学方式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多样结构的一例加以思索”。

第一章

序篇：世纪的回眸

为了导出本书的主题，必须对本世纪初我们民族的处境作一些简略的回顾与描述，对世纪初“文学革命”思路的由来与发展作一些简略的回顾与阐述。

大清帝国光绪二十五年腊月初一。

这一天清晨，阳光十分艰难地爬上乾清宫的重檐庑殿式的屋顶上。

这天，史册上记载：“帝称病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其实，德宗皇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年多前下诏“明定国是”预图变革，事未果而被幽禁在中海与南海之间的瀛台，早已不视国事了。只是这一天不知缘何突然“称病”。

这天，储秀宫里殚思竭虑的慈禧太后恹恹地蜷卧在巨大的凤榻上，她已经考虑立载漪之子爱新觉罗·溥隲为王储——“大阿哥”。

此时此刻，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20 世纪的脚步正开始

踏上中华大地？

到了很久很久以后，中国人才意识到 20 世纪对于有数千年历史的华夏古国将意味着什么，将带来怎么样的巨大的变化，到那时，中国人才听清楚了，从天边传来隆隆的世纪的脚步声，才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古老土地发出的一阵阵震颤。

新世纪的第一年，是夏历庚子年，是中国连连遭受厄运、蒙受耻辱的一年。

这年之始，几乎全世界的眼光都注视着中国。这里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这里上演了相当悲壮的一出“戏”。天朝帝国之子民于无意之中扮演了世界大舞台上的主角，好像中国人着意要为新的世纪揭开不平凡的序幕。

这一幕，史称“庚子事变”。

这是 1900 年 5 月外国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报道——

本月初爆发的反对清王朝和在华外国人的义和团起义，目前仍无平息的迹象。这次起义是统一排外情绪与日益加剧敌视基督教传教士的情绪相结合的结果。

义和团，本来是由那些利用业余时间练拳舞剑的不满的中国人组成的一个地方爱国团体。他们受端亲王和王室其他成员的影响。他们的活动中心虽在北京，但已在南方各省蔓延开来。据报道，南京、广州已发生骚乱，屠杀美、法、德等国的传教士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一些宗教组织给麦利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进行军事干预。^[1]

下面是一则 5 月 31 日的报道——

昨天义和团占领了通往北京的大门天津市，他们挥舞着被杀害的传教士的头。清朝政府宣布一条法令，禁止义和团活动。但是据报道，清军常常和义和团来往。美、英、俄、法、日的海军陆战队共 340 名士兵昨晚乘火车到达北京，这些部队显然是仓促凑集起来的，美国兵还身着冬装，俄国兵忘了带弹药。目下局势还算平静。^[2]

外国新闻记者报道的“平静”中酝酿着一场大杀戮。

义和团的拳头和大刀对付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洋枪洋炮。有很多原因使得这场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注定失败。

美国人克得斯顿·丹尼尔主编的大型资料书《20 世纪大博览》中收录的有关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是义和团员被杀头的场面。

中国刽子手们很职业的姿势，表明这种场面的经常上演。整齐列队的中国士兵似乎也还壮观。而骑在马上，显然是外国人。也就是说，这场屠杀，是在外国人监督下进行的。惟一值得我们快慰的是，在照片中，那位被缚着的赴死者，虽然他的形象很模糊，但还是能看出，他有我们所想像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气概。

当人类命运将发生重大变化的 20 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文学似乎已经敏锐地感到了新时代的胎动——

在新世纪到来的前五天，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

在新世纪到来的前两天，梁启超又提出“小说界革命”

的口号。

这位慷慨激昂之士，是不是预感到，在即将降临的世纪里，文学注定要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当义和团的勇士们用血肉之躯去撞击洋枪洋炮时，中国文界的勇士也酝酿着一场革命。

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这些文人（那时尚无“作家”之称号）差不多与梁启超同时感觉到了文学这个角色之于未来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开始投入小说创作。

李伯元：1900年，开始投入从事文学创作的准备，

1901年，他开始着手创作《官场现形记》；

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吴趼人：1903年，开始发表新小说《痛史》；

曾朴：1904年，发表新小说《孽海花》；

刘鹗：1906年，开始发表新小说《老残游记》。

新世纪的观念在文学的领域里产生了敏感的反应；文学敏锐地对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产生兴奋和激动。

倾心于文学的文人们纷纷吐露对这个世纪文学的充满热情的预言：

“20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腾达之烧点”^[3]。

“20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4]。

文学界对20世纪的到来所表达的热情和希望，后来都得到了应验；而且，小说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引起的反响、轰动和山崩地裂般的剧烈震动，远非世纪之初

小说的倡导者们所能逆料的。

世纪之初，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极大热情缘何而来？

可以说，这些热情不是缘于对文学的本身，而是缘于积极参与社会革命的热情。借用文学之酒来浇胸中的块垒，借用文学之“火山口”来喷发自己胸中的炽情。

正当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观念发生了一种位移：从对“技艺”、“器物”、“物质”的重视，转移到对国民精神的重视上。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启蒙思想的阳光透过厚重的城门的缝隙，照到尘封了几千年的中华大地上。怎样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成了国人思考的共同命题。

办“洋务”是那时一种勇敢而艰难的选择。买机器、买军舰、买火炮，“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一场执政者赖以巩固政权的“运动”破产了，也就是说，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无补于清帝国日渐衰败的命运，本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腐朽的封建政权就是不能相依存的。

但是，我们有理由说“洋务”带给中国的绝不仅仅是北洋水师的那些舰只，不仅仅带来近代科学技术的其他物质产品，重要的是带来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进步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颠覆了中华“天朝帝国”的千年梦幻，冲击了僵化、腐朽的“三纲五常”和荒唐的反科学的思想意识。

不论是引起紫禁城内苑火灾的电灯，还是唐胥铁路上用骡马来拉动的车厢；不论是京津公路沿线电线杆因被视为“妖术”、“魔法”而一次又一次地遭“义民”砍伐，还是那辆用二十八万两银子“进口”的机车终于抵挡不住“朝野”的愕愕而被迫